



選委會選舉競爭激烈彰顯優中選優

新聞背後
梅若林

距離新一屆選委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提名期結束尚餘3日，前往遞交提名表格的參選人不斷。本次是完善選舉制度後的第二次選委會選舉，不論從新選制的鞏固實施、民主選舉實踐的檢驗，還是從香港未來發展的角度而言，都至關重要。尤其香港接下來將以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落實首個五年規劃為核心任務，選委會的產生，關係到每一名港人的利益，社會各界不但要正確認識到其重要性，更要積極關注，方能實現「優中選優」，助力香港由治及興。

一些港人對今次選委會選舉的關注，可以濃縮成三個問題：為什麼香港社會需要關注選委會選舉？為何本屆選委會選舉如此重要？以及各界應對選委會委員抱持什麼期望和要求？

首先，為什麼香港社會需關注選委會

選舉？部分港人一直以來都覺得選委會選舉只關係到少數業界人士，與自己全然無關。這種想法其實大錯特錯。選委會是香港特區政治制度的核心組成部分之一，其不僅負責提名及選舉行政長官候任人，同時產生部分立法會議員；所有立法會議員候選人均需獲得選委會五大界別各至少兩名委員的提名，才能參選。此外，選委會亦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產生密切相關。尤其是特區選舉制度獲完善後，選委會新增包括基層、勞工在內的多個界別，讓不同階層的聲音有更多機會進入體制。

換言之，選委會直接決定誰來領導香港、誰來立法、誰來代表香港參與國家事務，影響的是每一位市民的就業機會、居住環境、醫療教育資源、就職機會以至社會整體的穩定。

事實上，本屆選委會選舉競爭尤為激烈。提名期自10月7日開始以來，截至昨

日已累計接獲1115份候選人提名表格及40份指定團體提名表格。其中在首日接獲的305份候選人提名表格中，約四成參選人並非現任委員。而在需要選舉產生的界別分組中，有約30個出現超額參選。除了反映「愛國者治港」原則下社會參與意願提升，更意味着市民有更大空間去比較候選人的履歷、政綱與能力，亦唯有主動關注、正面了解每一位參選人，了解如何服務業界與香港整體，才能達至「優中選優」的效果。

其次，本屆選委會選舉為何如此重要？現在的香港正處於發展關鍵時期，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也處於特區政府公布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之際；與此同時，國際形勢正深刻改變，全球經濟格局重構、地緣政治緊張、科技競爭加劇，對香港這個高度開放小型經濟體影響深遠。千載難逢的機遇與前所未有的挑戰並存，要求香港必須具備更強的韌性和競爭

力，而且還要進一步鞏固強化「內聯外通」的獨特優勢。在此背景下，選委會能否發揮應有作用，選出能夠帶領香港前行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至關重要。

行政長官是特區的掌舵人，負責制定並執行政策；立法會則審核預算、立法及監察政府。要產生一隊具備大局觀、專業能力與執行力的管治團隊，就必須先確保選委會每一名委員德才兼備、履職盡責，這也正是選委會選舉如此重要的原因。

最後，各界應對選委會委員抱持什麼期望以至要求？香港未來五年以至更長遠的首要目標，就是把首個五年規劃的願景全面落實，更好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特區政府在五年規劃中，制定了105個指標，包括22個主要指標，聚焦強化「四中心、一高地」、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提升民生福祉，以及統籌發展與安全。

不難看到，規劃涵蓋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北都發展、民生改善等方方面面。這意味每一位選委會委員除了代表相關業界發聲、反映業界訴求外，更必須具備清晰的大局觀，不能只拘於一隅。委員應放眼全局，以追求社會整體共同利益為最大原則。例如工商界委員不能只追求短期利潤，更要思考如何結合創新科技實現產業轉型；不同專業界別的委員也要超越專業門戶之見，為民生政策提供客觀專業意見。

今年的選委會選舉注定是香港政治生態的重要里程碑。社會各界應主動關注候選人政綱與背景，投票人更應慎重行使權利。唯有選出真正德才兼備、胸懷全局的委員，才能確保選委會有效發揮職能，選出能帶領香港把握機遇、應對挑戰的「當家人」，落實五年規劃目標，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讓每一位香港市民都能共享發展成果。

廣泛參與映照優質民主的底色

議論風生
胡筠

本次選委會選舉提名期甫一展開，報名熱度便遠超預期。首日即接獲逾300份提名表格，較上屆同期多出約兩成。隨著提名期推進，累計報名人數已突破1100人，超過上屆整個提名期的總數。更值得關注的是，出現差額競爭的界別分組已達30個，較上屆多出逾倍。這些數字背後，折射出的是新選舉制度以高度認受性，以及香港社會各階層、各行業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意願。廣泛參與從不是口號，而是正在發生的政治現實。

完善選舉制度後，上屆選委會選舉成功舉行，而本屆選舉更呈現出諸多積極變化，尤其是參與熱度。以鄉議局為例，上屆全部自動當選，本屆首日報名便已「超額」，必須經由投票才能分出勝負。漁農界60個席位錄得70餘人報名，旅遊界、商界（第三）等多個界別同樣出現超額競爭。即便是上屆多個無需投票的工商金融界，本屆亦有最少16個界別分組進入競爭狀態。從「等額」到「差額」的轉變，意味着參選者不再將選委席位視為理所當然的榮譽分配，而是需要以政綱和服務承諾去爭取選民認可。

參與的「廣泛性」不僅體現在人數上，更體現在參與者來源的結構變化。本屆選舉中，有高比例的參選人為首次參選。以第一界別「工商、金融界」為例，已報名的300餘人中，逾半未在上屆同一分組參選，地產及建造界的新面孔比例更高。這些「新丁」並非政治素人式的象徵性參與，而是具備深厚行業資歷

的專業人士。教育界的參選者中不乏校長和資深教育工作者，工程界的參選人多為從業數十年的業界翹楚，金融界則湧現銀行業高層管理人員的身影。與此同時，部分上屆落敗者選擇再次報名，以行動表達對選舉公平性的信任。「新丁」與「老將」同場競技，既保證了經驗的傳承，又注入了新的視角與活力，使參與的廣泛性具有了代際更替和人才湧現的深層意涵。

理解本屆選委會選舉的廣泛參與，需要置於其制度設計的邏輯之中。選委會由五大界別構成，覆蓋工商金融、專業服務、基層勞工、地區組織及全國性團體等多個層面。這種按界別劃分的選舉方式，制度初衷在於讓不同功能團體透過代表表達自身訴求，讓社會各方利益得到較為均衡的反映。當各界別都出現踴躍報名和差額競爭時，這一制度設計的效能真正釋放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廣泛參與不僅是選舉氣氛的指標，更是制度設計目標得以實現的前提條件。而本屆選委會選舉的提名階段，就足以體現這一制度初衷。

未來將選出的新一屆選委將肩負起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及選出部分立法會議員的憲制責任。當更多來自不同背景、具備不同專長的人士經過競爭性選舉的檢驗進入選委會，其決策的代表性和專業性便有了更堅實的基礎。提名期展現的報名熱度與競爭態勢，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提供了良好的開端。各界期待，接下來的選舉過程能將這份參與熱情轉化為良性的政策辯論與選賢任能，共同推動香港發展。

新皇崗口岸是深度融入大灣區的新起點

有話要說
葉建明

重建後的皇崗口岸日前開通。這座全球最大的陸路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全新通關模式，旅客通關時間由過去的約30分鐘壓縮至約5分鐘。行政長官李家超指出，新口岸開通是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新皇崗口岸開通是香港深度融入大灣區的新起點，它同時完成了三重結構性轉變：

第一重轉變，是「一地兩檢」所代表的跨法域治理制度的實質性落地。新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並非簡單的流程優化，而是港深兩地在查驗機制上的系統性重構。口岸首創「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驗通道，將香港入境處、深圳海關、深圳邊檢三家單位的查驗與檢疫職能集成於一條通道，旅客「一次通關」即可同步完成全部手續。車輛通關方面，港深首次採用「五合一」合作查驗通道，一次性完成五家查驗單位的信息採集與系統核驗，車輛通關時間由約10分鐘壓縮至2分鐘以內。

這一模式的意義在於：它證明制度差異不必成為融合的障礙，只要敢於創新、主動對接，差異完全可以轉化為協同發展的獨特優勢。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已明確提出，新通關模式將在重建後的沙頭角口岸應用。皇崗口岸由此成為了一個制度模板，而非孤例。

第二重轉變，是口岸空間功能的根本性重構。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全面取消貨檢功能，定位為純旅檢口岸，釋放出的土地，全部用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方園區建設，打造「口岸服務+國際科創」雙核樞紐。河套合作區是粵港澳大灣區唯一以科技創新為主題的特色平台，而新皇崗口岸與之緊密相鄰，通過高效通關將港深之間的物理阻隔降至最低，使得跨境科研協作在時間成本上接近同城化水平。

第三重轉變，是口岸的經濟角色從「流量過境」向「價值增量」升級。皇崗口岸是24小時通關的陸路口岸，當口岸從「早上過關、晚上回來」的通道變為24小時運作的常態化連接節點，跨境消費、跨境辦公、跨境研發就不再是例外安排，而具備了日常化的條件。流量的頻率和便捷度一旦跨過某個閾值，量變就會引發質變——人的頻繁流動會催生商業，商業的聚集會催生產業。

這三重轉變合在一起，指向的是香港在大灣區中角色的一次重新定義。長期以來，香港在大灣區中的定位側重於「超級聯繫人」。但「聯繫人」的角色隱含着一個前提：香港的價值在於「經過」，而非「停留」。新皇崗口岸所撬動的河套科創平台與北部都會區建設，正在為香港打開另一種

可能性：香港不僅可以「經過」，也可以「承載」。當科研人員、跨境企業、國際資本因為高效的通關和完善的產業配套而選擇在北部都會區設立實體、落地項目，香港融入大灣區就從「通道經濟」升級為「平台經濟」。

五年規劃已明確將北都定位為「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的主平台、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引擎」，而北環綫支綫將會連接新皇崗口岸，構建「軌道上的粵港澳大灣區」。支綫開通後，新口岸將會成為香港北部經濟走廊的「心臟」——每一次高效通關都在為這片區域輸送人才、創意和資本。

當然，從「起點」到「格局」，中間仍有不短的距離。口岸開通初期面臨設備磨合、交通接駁等現實挑戰，北環綫支綫尚需時日建成，「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新模式也需要在實際運行中積累經驗。但「起點」的意義恰恰在於，它確立了一個不可逆的方向。新皇崗口岸正在用一座建築和一套制度，把「一國兩制」從抽象的政治原則變成了具體的治理實踐——證明差異可以被管理，邊界可以被柔化，而融合可以在不消除差異的前提下實現。以這座口岸為起點，香港融入大灣區的進程正在從「通」走向「融」，從「通道」走向「引擎」，從「經過」走向「扎根」。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副理事長

央企涉外服務生態體系賦能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開放——構建內外聯通樞紐，夯實制度型開放試驗田

議事論事
韓俊克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一帶一路」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依託「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香港國際金融與貿易中心功能、珠三角雄厚產業基礎，正加快打造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樞紐。近年來，以中央企業為核心搭建的涉外服務生態體系持續落地大灣區，串聯跨境金融、涉外合規、全球供應鏈、國際科創、跨境人才服務等全鏈條能力，既重塑區域對外開放的底層能力，也與香港高度發達的專業服務業形成深度協同。這套生態體系的建設成效，既直接關係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鞏固提升國際中心地位，也關係中央企業國際化經營與境外國資監管大局，受到政商各界的高度關注。

中央企業涉外服務生態，並非單一企業的跨境業務，而是以央企鏈主資源為牽引，聯動港澳專業服務機構、內地地方平台、市場化服務商形成的共生網絡，覆蓋企業跨境經營全生命周期：從境外項目投融資、跨境法律合規、國際物流供應鏈，到跨境技術合作、國際標準對接、境外風險處置。依託大灣區獨特的跨境制度場景，這套生態體系把中央企業多年全球經營積累的海外網絡、項目經驗、風控能力，轉化為可向灣區各類主體共享的公共服務能力，成為推進制度型開放的重要載體。

從國家戰略層面看，大灣區同時擁有香港這一國際離岸金融與專業服務中心、成熟普通法法律服務體系、全球航運網絡，以及珠三角完整產業腹地。目前招商局、

華潤、中國旅遊集團、紫荊文化四家央企總部扎根香港，大批央企在前海、南沙、橫琴布局區域總部與涉外服務平台。數據顯示，中央企業承擔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約七成、對外承包工程六成業務，在全球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布局項目與分支機構。而大灣區龐大的外向型市場主體與央企涉外服務能力形成強大供需共振。

第一，跨境金融服務生態與香港離岸市場深度耦合，賦能企業跨境投融资。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與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也是央企境外發債、資本運營的重要平台。國家電網、中國國新等多家央企在港發行境外人民幣債券，持續擴容離岸人民幣流動性池。依託招商永隆銀行等駐港央企金融平台，跨境理財通落地升級，截至2026年上半年參與投資者超18萬戶、資金匯劃1403億元；債券通、互換通持續擴容，2025年債券通北向全年成交9.7萬億元。這套體系不只服務央企自身海外項目，更向大灣區地方國企、民營製造企業開放，幫助灣區企業以較低成本在香港開展海外融資、跨境資金歸集與外匯風險對沖。香港國際投行、資產管理、保險再保險等專業服務與央企金融生態相互支撐，共同降低中小企業出海門檻。

第二，香港普通法專業服務與規則銜接生態深度融合，破解制度距離難題。跨境經營最大成本往往不是資金成本，而是不同法系、不同監管體系帶來的制度成本。香港作為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擁有與國際接軌的商事法律、仲裁與爭議解決體系，其法律、會計、仲裁專業服務是央企涉外

生態最具價值的制度元件。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多家國際頂級律所與會計師事務所長期服務央企境外項目；香港律師、大律師、會計師、稅務師深度參與跨境交易架構設計、境外合規與爭議解決。同時，香港專業服務正加快進入內地市場：533名港澳律師獲准在內地執業、619名港澳工程專業人士取得內地職稱，深圳國際仲裁院境外仲裁員佔比超36%，前海、河套、橫琴持續推進專業資格互認與跨境數據試點。央企依託香港普通法資源處理跨境爭議、開展境外合規的成熟經驗，可向地方政府、地方國資、涉外機構提供直接參考，使香港專業服務成為全國企業出海的基礎設施。

第三，全球供應鏈生態與香港航運專業服務協同，提升聯通全球硬實力。香港是全球重要航運中心，與招商局等央企港口運營資源、珠三角港口群共同構成世界級樞紐。招商港口全球集裝箱吞吐量超1.5億標箱，聯動廣州港、深圳港形成協同網絡；香港作為自由港，提供成熟的航運融資、船舶經紀、海事保險、物流管理等專業服務。央企多式聯運與全球港口網絡與香港航運專業服務相互賦能，既服務央企海外工程物資調度，也向大灣區外貿企業、跨境電商、地方物流企業開放艙位、全球海外倉與跨境供應鏈風控能力，幫助市場主體穩定全球供應鏈布局，對沖地緣風險。

第四，緊扣各方關切，凝聚央地港澳合力，放大生態戰略價值。中央企業涉外服務生態在大灣區的深化，正與國家多個戰略規劃高度契合，成為多方協同破題的

共同抓手。大灣區作為央企「走出去」的前沿基地，既是央企境外項目的「後方中樞」，也是境外風險防範的「練兵場」。依託香港成熟的國際金融與法律服務環境，央企可在大灣區集中建設境外項目風控、跨境合規、國際結算的共享平台，既提升央企境外資產運營效率，也為國家強化境外國資監管提供可操作、可複製的灣區方案。央企涉外服務生態在港布局，直接帶動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綠色金融、家族辦公室、專業仲裁等業務放量，為香港國際中心注入新的業務來源，也讓香港專業服務借助央企鏈條「走出去」服務全國乃至「一帶一路」市場，實現香港優勢與國家戰略的相互成就。

第五，國際科創協同生態，構建「港澳基礎研究+灣區工程轉化+央企產業化」創新鏈條。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建設，離不開央企重大科技基礎設施與跨境科研協同能力。中國散裂中子源、中廣核華龍一號技術平台、中國移動港澳聯合實驗室等平台落地灣區，跨境科研經費撥付實施。央企科創生態的價值不止於技術攻關，更在於開放科研平台、聯合攻關機制，支持大灣區民營企業、高校、港澳科研機構參與國際標準制定與跨境技術合作，香港高校基礎研究優勢、國際科創人才資源與央企產業化能力、珠三角製造轉化能力相互銜接，助力灣區科創成果走向全球。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必須客觀、審慎看待生態體系面臨的現實挑戰，這既是各方關注的焦點，也是地方國資、涉外機構必須防範的風險點。一是制度與監管風險。

跨境經營橫跨內地、香港、境外多法域，稅收、數據、反壟斷、出口管制等規則差異顯著，央企成熟合規體系尚未完全向各類市場主體共享，中小企業跨境合規能力薄弱，爭議與違規的跨境取證、執行成本高昂。二是數據透明与信息分散。央企涉外服務供給缺乏統一統計口徑，地方政府難以精準評估本地涉外服務缺口，資源配置存在一定盲目性。三是高端涉外人才結構性缺口。跨境合規、跨境財稅、跨文化管理、國際仲裁等複合型人才供給不足且區域分布不均，港澳專業人才與內地產業需求的對接機制仍待完善。四是區域發展不均衡。南沙、前海、橫琴等平台集聚效應突出，珠江西岸及粵東西北城市涉外服務供給相對薄弱。五是地緣政治與境外監管風險上升。海外市場准入收緊、供應鏈制裁、跨境數據安全、海外投資保護等不確定性增加，各類出海主體風控能力參差不齊，一旦集中爆發可能形成連鎖衝擊。六是協同與競爭張力。央企生態與香港本地專業機構、地方服務商既互補也存在同質競爭與利益分配問題，協同機制不健全可能影響生態整體效能。

展望未來，隨着境外國資監管體系持續完善，大灣區進一步發揮「一國兩制」獨特優勢，央企鏈主資源、香港國際化專業服務、珠三角產業腹地三者加快深度融合，大灣區將從外向型產業基地升級為國家級涉外服務樞紐，為全國企業參與全球競爭提供可複製、可推廣的灣區方案，助力中國更好聯通世界。

上海外國語大學企業出海聯合研究院特邀研究員